

【明清丝路】

“海上书籍之路”：清前期汉籍入琉 与福建书籍的供销网络

孙 岩

摘 要：17—18 世纪，大量汉籍通过闽浙沿海的朝贡活动与海上贸易流播域外，中华文化由此进一步影响了东亚地区。康熙朝开海后，清廷对琉球实行优待政策，大批琉球学人得以常驻福州，并广泛地购买汉籍和刊刻著作。儒学、教化及诗文图书为入琉汉籍之大宗，史籍、医书以及闽纸和闽版也持续输入琉球。当时福建形成了以福州为中心，向内关联建阳、四堡和江南等出版腹地，对外连接琉球、日本等海外市场的书籍供销网络。琉球人遂充分利用福建书业，助力琉球文教和出版业的发展，最终推动了东亚的“书籍环流”及文明互动。可见东亚的海路不仅是朝贡与商贸之路，亦是一条覃敷文教的“书籍之路”。

关键词：琉球 汉籍 福建 供销网络 文化交流

清前期，以程顺则为代表的琉球学子频繁渡海，于闽地求学之时广泛地购买汉籍和刊刻著作，中琉文化由此实现了更深层的互动。此前学界主要从整体上勾勒中琉文化交往，并围绕移民群体和来华勤学生的事迹展开讨论，^① 近来亦有学者注意到汉籍在琉球社会的流传与再生问题。^② 但受限于材料和选题倾向等原因，人们对汉籍入琉的诸多情形仍不甚清楚，如其阶段、途径、种类以及汉籍入琉现象背后的政治因素、社会基础与文化影响等问题。由于福建刊刻的汉籍和雕版对琉球、日本社会均有深远的意义，故本文拟在进一步挖掘中、日材料的基础上，以程顺则等琉球学人的活动为线索，勾勒出福建书业的联动效应，在揭示汉籍入琉的过程及其影响之时，呈现出政策、学人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互动情形，进而反思东亚的“书籍环流”与文化交融形式。

一 清琉交好与琉球学人的书籍活动

琉球介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，这样的地理位置使琉球在东亚商路与文化交流当中承

^① 参见谢必震：《中国与琉球》，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；赖正维：《清代中琉关系研究》，海洋出版社 2011 年版；谢必震：《从清朝档案看中国文化在琉球的传播》，《历史档案》1994 年第 3 期；（日）上里贤一著，陈玮芬译：《琉球对儒学的受容》，《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》第 3 卷第 1 期，2006 年；关于琉球勤学生，学界主要围绕程顺则等代表人物的事迹展开，参见徐恭生：《琉球国在华留学生》，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1987 年第 4 期；（日）崎原丽霞：《从程顺则生平著作看儒学在琉球国的传播》，《日本问题研究》2010 年第 2 期。

^② 高津孝等人初步探讨了汉籍在琉球的流传。（日）高津孝：《琉球における書物受容と教養》，载（日）岛村幸一编：《琉球：交差する歴史と文化》，日本勉诚出版社 2014 年版，第 141—162 页；王小盾、吴云燕：《从古文书看汉籍在琉球的流传与再生》，《域外汉籍研究集刊》第 21 辑，中华书局 2021 年版。

担了一定的角色。琉球至明初始通中国，但在明清朝贡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朝鲜，与中国交往甚密，“其虔事天朝，为外藩最云”^①，既是明代事实，亦是清修《明史》时的现实映射。而大量汉籍在17—18世纪进入琉球，首先得益于清廷的对琉政策和琉球学人的群体性努力。

清初东南地区战事连连，海域失序，但琉球仍屡次尝试与清廷建交。三藩之乱时，耿精忠曾派人招抚琉球，“王不肯从”，且遣使“探问清朝安否”。“圣祖大悦”，并屡赞琉球“当闽疆反侧，海寇陆梁之际，笃守臣节，恭顺弥昭，克殫忠诚，深可嘉尚”。^② 这为此后清廷的对琉政策奠定了基调。

随着三藩与台湾的平定，清廷转向开海，采取了积极的睦邻政策。康熙朝向琉球派遣册封使团的次数居历代之冠，在使臣升格、税额减免、贡使人数及其礼遇提升等方面对琉球多有优待。^③ 康熙帝还御书“中山世土”赐予琉球国王，雍正帝又书“辑瑞球阳”颁交来使，故称清廷“优恤至意，超越千古”^④。同时，康熙朝重新接纳琉球官生入太学肄业，并给予优待。^⑤ 除官生外，琉球还可派遣大量的勤学生长驻福建。被誉为琉球五伟人之一的程顺则，便是早期勤学生的杰出代表。

程顺则（1663—1734）以儒学造诣和改革琉球政教闻名，他对中华文化的吸收和传播，与其长期在福州的学习经历和书籍活动密切相关。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，程顺则被授予“通事”之职，随谢恩使团来华，留驻福州柔远驿，并以“勤学”的身份拜儒士陈元辅为师。在四年多的在华生活中，程顺则结交福州士人，见识了大量汉籍，为他在华的人际网络及后续活动奠定了基础。期间所见的《六谕衍义》令他印象深刻，“是书词简义深，言近指远，不独可以挽颓风而归醇厚，抑可以教子弟而通正音”^⑥，此即程顺则日后将其“刊布国中”的缘由。康熙二十七年，程顺则奉命为接贡存留通事赴闽，居柔远驿三年，再随陈元辅研习理学和诗文。归国前，他“在闽捐资二十五金，购得十七史全部……归献孔子庙”^⑦，以供琉球学子查阅。康熙三十六年，程顺则候船期间又将自己在华所作诗文编成《学堂燕游草》，并自费刊印，回国传布。^⑧ 康熙四十六年，在福州“捐资六十金”，刻印《六谕衍义》《指南广义》及其子生前所作诗稿，并将刊本与书板带回琉球，以供重印和翻刻。后期程顺则又以重金购得《朱子真迹》《诗韵释要》等书籍，归国后献予国王。康熙五十九年，他又自费购买了数十部《皇清诗选》，将其分赠与琉球王府内书院、孔庙、评定所及其师友。^⑨ 康熙六十至雍正三年（1725），程顺则在郑晃、王登瀛等友人的支持下，于福州陆续编印《中山诗文集》^⑩，这也是古代仅有的一次对琉球汉诗成就的收集和检阅。此后程顺则因年老未再赴闽，但仍在琉球和日本推广汉籍。^⑪ 《琉球国志略》载程顺则“勤学励志……爱民洁己，不营宠利”，“卒之日，书籍外，无余货，国人至今犹争道之”。^⑫

① 《明史》卷323《琉球传》，中华书局1974年版，第8370页。

② （琉）蔡铎、蔡温、郑秉哲：《〈中山世谱〉校注本》卷8《尚贞王》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132页。

③ 赖正维：《清代中琉关系研究》，第14—23页。

④ （清）任五伦：《中山诗文集跋》，《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》第22册，鹭江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349页。

⑤ 《清圣祖实录》卷115，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丁未，《清实录》第5册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201页。

⑥ （清）竺天植：《六谕衍义序》，《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》第2册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18页。

⑦ （日）那霸市编辑委员会：《久米村系家谱》卷1《程氏家谱》，日本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编集室1980年版，第546页。

⑧ （琉）程顺则：《学堂燕游草》，《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》第25册，第52—61页。

⑨ 以上参见《久米村系家谱》卷6《程氏家谱》，第546—549、557—558页。

⑩ 《中山诗文集》在1721年初版于福州，经四年完成。日本国立公文图书馆藏有1725年的福州刊本。参见严明：《东亚汉诗流变》，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，第639、730页。

⑪ （日）上里贤一：《琉球对儒学的受容》，《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》第3卷第1期，2006年，第13页。

⑫ （清）周煌：《琉球国志略》卷13《人物·程顺则》，《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》中册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1130页。

程顺则作为琉球传播汉籍的先行者，一生五次来闽，在华生活 10 多年，各类文献中记载其购买或刊刻汉籍的重要事例共有 10 次，其中至少有七次发生于福州（表 1）。在汉籍种类上，前期主要是史籍和教化类图书，后期则以诗文为主。由于他多次将所购汉籍献予琉球学校，引起后续学人的效仿，故琉球有“文庙两庑皆蓄经书，多自福州购回”之说。^①

表 1 程顺则主要购刊书籍活动

次序	时间（年）	地点	书籍	总量	活动类型
1	康熙二十八年至康熙三十二年	福州	《十七史》	各一部，共 1592 卷	购书
2	康熙二十八年	福州	《雪燕堂游草》	未知	刻书出版
3	康熙四十六年	福州	《六谕衍义》	书板、书籍各一部	刻书出版
4	康熙四十六年	福州	《指南广义》	书板、书籍各一部	
5	康熙四十六年	福州	《焚余稿》	未知	刻书出版
6	康熙四十七年	天津	《朱子真迹》	一册	购书
7	康熙五十四年	福建	《诗韵释要》	一部	购书
8	康熙五十九年	江南	《皇清诗选》	每部 30 卷，共数十部	购书
9	康熙六十年至雍正三年	福州	《中山诗文集》	未知	刻书出版
10	雍正三年	日本 京都	《枕山楼诗集》 《枕山楼课儿诗话》	未知	刻书出版

其他琉球学人也常在福建购买和刊刻汉籍。如 18 世纪初的《官话问答便语》曾将琉球人在福建的常见场面编为汉语会话课本，其中有条关于购书的内容：

勤学：“我要《四书体注》一部、《古文》一部、《唐诗》一部、《诗经》一部、《易经》一部、《礼记》一部、《书经》一部、《春秋》一部。”店家：“……书在这里，相公请看。”勤学：“这书不当好，字又糊涂，板又假，故乃是土板，我不中意。我要的是苏板，字画分明，纸张白净方好。”店家：“有，价钱会贵些。”勤学：“我只要好的……你这个价钱开忒贵了，这些书我们年年都有买的，我都是晓得，不用许多。”……店家：“相公价还太少了，折本生意，断难从命……。”勤学：“你说笑话，这几部书如何差得几钱银子，你总是要添。也罢，再加钱半钱就是了。”店家：“好，我若不卖，相公一定要怪，卖又折本。罢了，此番相让给相公，望你下回再来买书补过。”^②

材料中反映了几点问题：一是琉球学人常年购书，且熟悉行情，还价之事常有；二是福州书店能为琉球人提供不同层次的选择；三是琉球人常购四书五经及诗文类书籍，且购买这类用书者甚多，否则不会以此作为典型案例。其他一些细节亦透露出琉球人在福建的购书情况，如琉球通用版《近思录》即为福建刻本，且其孔庙收藏的插图本《四书集注》，各卷末多有“后学余象珍赞”及“余明台刻行”的字眼^③，可知该版《四书集注》或是由明末建阳余氏克勤斋所刻，或是根据建本复刻而成；明伦堂使用的《四书备旨》《五经体注》《六谕衍义》等教材，也多采购或刊印于福建^④；

①（清）黄景福：《中山见闻辨异》，《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》第 30 册，第 405 页。

②（琉）佚名：《官话问答便语》，《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》第 33 册，第 345-347 页。

③（清）潘相：《琉球入学见闻录》卷 2《书籍》，《台湾文献史料丛刊》第 299 种，台湾大通书局 1984 年版，第 78、80 页。

④ 参见（日）高津孝：《琉球における書物受容と教養》，载（日）岛村幸一编：《琉球：交差する歴史と文化》，第 148-150 页。

而范翔参订的《四书体注》在乾隆时传入琉球，同样被广泛使用。

可见，琉球贡使和学人在汉籍入琉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，这有别于当时以商人为主要中介的中日汉籍交流形式。^① 在入琉汉籍中，以儒学、教化及诗文类书籍为大宗，史籍则以“十七史”为主，还包括下文涉及的医书等实用图书。由于琉球、日本都是经由海路购运汉籍，因而这条路线也构成了流播汉籍的“书籍之路”。不过，当时琉球僻处海外，华商罕至，琉球人来华要“走巨舟，冒风潮五六千里而后至福州”^②，倘若没有琉球学人的努力，汉籍入琉恐会继续迟滞。也正是在清前期中琉交好的背景下，大量琉球学人得以常驻福建，并持续开展书籍活动。

二 福建的书籍供销网络与琉球市场

康熙时，琉球各岛已“渐通中国字”，并“购蓄中国书籍”^③。至乾隆初，琉球上自国学下至私塾所用教材“多购于内地”^④，以致“福州刻琉球本”成了东亚汉籍版本学的新名词。^⑤ 这些现象得以形成，与福建发达的书籍供销网络密切相关。

围绕原材料的生产、刻工的流动、图书的印刷和销售，明清东南地区形成了不同层次的书籍供销网络。狭义上，书籍供销网络包含出版成本、售卖价格及市场流通情况等要素，直接关涉人们获取书籍的难易程度。广义上，造纸、刻印等书籍生产中的各个环节，乃至是中外书籍的刊刻和互动等现象，也应纳入思考范畴。既可从微观的时空对象着手，探寻书籍的印刷、流通等具体现象，亦可从中国乃至东亚等宏观的维度，关照文明互动等问题。而福建在明中叶就已号称“图书之府”，17—18世纪福建的三大书业中心更是实现了产、供、销的专业化分工，形成紧密联动的供销网络。

福州是其中的枢纽。作为福建的政治、经济与文化中心，福州拥有丰厚的出版资源，其刻书以规模大、质量佳而闻名。明代福州官府刻书的数量就已稳居全省之首，且质量甚佳。^⑥ 至清代，福州官刻书籍多为钦定经史，私刻亦有大量有益风教的图书和乡邦文献。如鳌峰书院在康熙四十六年刻印的《正谊堂全书》，“取朱子语类、学的、文集、文类……真西山诸文集，尽刊布之，凡五十种”。^⑦ 这部500卷有余的丛书汇集了宋代以来的闽学名著，昭显出福州书院刻书之盛。同时，福州的寺院刻书也渐臻高峰，如涌泉寺所刊佛经之多，雕印之精，一时独步禅林。该寺于清初刻印的《法华》等书极为精湛，“驰名誉于异域”^⑧，在日本、琉球、马来西亚等国广为流布。

福州繁荣的官私刻书也带动了坊刻业的发展。由于中外官僚、文士往往汇聚于此，庞大的书籍需求可以反哺市场，故福州的坊刻业在清代发展成南方重要的销售中心。适时福州的书肆集中在南后街，即今日“三坊七巷”的中心地段，有带草堂、古香斋等数十家书坊。周边官衙、学校密集，图书需求量大，共同构成了繁荣的书市圈。从琉球馆到南后街较为便利^⑨，程顺则等人的书籍活动就有相当一部分是于南后街进行。还有一则材料透露出琉球人在福州购书的情形：

（友人）问：“去书店里买几本书么，是什么书呢？”（勤学）答：“要买一部《四书体注》、

① 中日汉籍流通的研究可参见（日）大庭修著，戚印平等译：《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》，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。

② （清）孙衣言：《琉球诗录序》，《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》第31册，第125页。

③ （清）徐葆光：《中山传信录》卷4《琉球三十六岛》，《台湾文献史料丛刊》第306种，第131页。

④ （清）潘耒：《琉球入学见闻录》卷2《书籍》，《台湾文献史料丛刊》第299种，第78页。

⑤ 陈正宏：《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序三》，《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》第1册，第3页。

⑥ 参见（明）周弘祖：《古今书刻》上编《福建》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，第359页。

⑦ （清）游光绎：《鳌峰书院志》卷16《杂述》，《中国历代书院志》第10册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446页。

⑧ 释弘一：《福州鼓山度藏经板目录序》，载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：《鼓山艺文志》，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594页。

⑨ 今日在原址上重建的柔远驿，与南后街相距约3公里。

一部《诗经注》、一部《书经注》、一部《礼记白文》、一部《春秋胡传》，还要买一部《古文觉斯》，并一部《唐诗》。”问：“买这许多的书，要带好些银子去了。”答：“银子也带不多，只带得二三两就是了。”问：“有二三两差不多就够了。就是买了一个人怎么拿得回来呢？”答：“买了就雇个人挑回家去”。^①

可见，在福州购书相对便宜且运输方便，故琉球人乐于利用福州的书市，为其个人与国家汲取文化资源。

在此基础上，清前期的福州与江南、日本、琉球形成了紧密联动的海上书籍供销网络。前揭琉球学人要“字画分明，纸张白净”的“苏板”而非“土板”，以及他们与店家就书价和“年年都有买”的对话，说明福州书坊常年供销“苏板”，暗示了福州与江南书业的联系。福州书业与日本的关联则直观地体现于唐船贸易上。在西川如见《增补华夷通商考》例举的中华十五省土产中，提到书籍的只有应天府和福州府。而在日本元禄以前（1688—1703），来日唐船亦以福建船居多。^②有学者统计，在清廷开海前的37年间，至少有12只福州船装运过汉籍到日本，数量至少为92箱又6包，同期的南京船只有10只装运汉籍到日本。^③梳理永积洋子整理的材料，可发现此期福建船载往日本的汉籍至少有111箱又7包，其中至少包括15只福州船曾载书到日，总数至少有103箱又7包。^④两相参照，即可知晓福州在清前期中日书籍贸易中的重要地位。

福州能够在东亚书籍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，不仅因其具有区位优势 and 发达的书业，更在于它背后有建阳、四堡等出版腹地与纸品市场的有力支撑。建阳在明代就以书多且价廉闻名，适时建阳书业依仗外部销路，已被纳入包括福建和江南在内的大图书市场。^⑤然而，受明末清初的战乱和禁书政策的影响，建本在康熙时已“不复过岭”^⑥。尽管繁盛不再，但时人的活动透露出建阳坊刻在康熙中至乾隆初仍有相当的活力。如康熙三十四年，潘耒得知“闽中剞劂之费甚廉”，特携顾炎武《日知录》至建阳，“鸠工刻之以行世”；建宁知府庞垲在京时曾无力刻书，出守建宁后，因“麻沙乃刻工之所萃，始获板行之”。^⑦大量刻工的存在，也为福州等周边府县提供了刊刻资源。沙县知县林采就曾于康熙四十年向建阳“远聘书坊善书数人、善刻数十人”^⑧，刊印刚修成的地方志。这同中琉关系的全面发展恰处同一阶段，而建阳又是琉球使团往返京闽的必经路段，故琉球人有足够的机会与建阳书业产生联系。^⑨

此时期建阳书业也被纳入了福州和琉球、日本的书籍供销网络当中。目前日本部分图书馆藏有上千部建本汉籍，许多正是以14—18世纪的建本为底本进行翻刻或重印的，且大多留有建本的版式、行款和牌记等信息。如清初建阳书坊曾广泛刊印建邑名士游艺的作品，其著名的《天经或问》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，日本江府嵩山房在1730年重印此书时，依据的底本正是建阳余明刻本；游艺的《诗法入门》作为诗歌入门宝典，在日本也有广泛的销路，日本人不仅在1690年据原版重刻，

①（琉）佚名：《学官话》，《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》第33册，第178—179页。

②（日）大庭修：《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》，第43页。

③ 范金民：《缥囊帙帙：清代前期江南书籍的日本销场》，《史林》2010年第1期，第76页。

④ 范金民遗漏了1652年3月的两艘福州船（分别载有中国纸21箱、汉籍3箱和汉籍3箱、纸32包）。材料参见（日）永积洋子编：《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覽 1637—1833年：復元唐船貨物改帳・帰帆荷物買渡帳唐》，日本创文社1987年版，第38—99页。

⑤（美）贾晋珠著，邱葵等译：《谋利而印：11至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，第210、213页。

⑥（清）王士禛：《王士禛全集·居易录》卷14，齐鲁书社2007年版，第3951页。

⑦（清）潘耒：《遂初堂文集》卷6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170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304、311页。

⑧（康熙）《沙县志》卷首《凡例》，康熙四十年刻本，第17b页。

⑨ 如琉球人魏学源的《福建进京水陆路程》记录了沿途的地名、风俗和物产情况，显然参考了当时福建书市流行的日用类书以及商编路线图。参见王振忠：《琉球汉文文献与中国社会研究》，《海洋史研究》第10辑，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，第602页。

而且在19世纪初又两次重新选刊；《唐诗鼓吹》也曾于1689年在日覆刻，其底本为顺治十六年（1659）建阳明雅堂江碧潭刻本。^①而琉球人在福州书店提到的“土板”具有典型的建本特征，很可能就是从建阳或四堡运来的。

闽西的四堡书业也是清前期福建书籍供销网络的重要部分。四堡书商或将书籍带出售卖，或是在福州、泉州等地开店经营，形成以家族组织为依托的供销链条，从而将四堡书业融入了东南沿海的商贸网络。^②最早传入琉球的《四书体注》便很可能是四堡本^③，而各版琉球官话课本中的对话也证明此书在福州书市中较为常见。闽西北同时是明清造纸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，延平、建宁、邵武、汀州各府皆造纸，晚明藏书家胡应麟评价“其厚不异于常而其坚数倍于昔……价直既廉而卷帙轻省，海内利之”^④。清代汀州纸品更是“远行四方”^⑤。因此，不论是四堡书商在福建内外的经营网络，还是为书业发展提供材料支撑的闽西纸品，均在整体上优化了福建的书籍供销条件。

拓宽视域，可发现福建同时是中外书籍互通之地。明末清初的建阳书业享誉中外，尤其是建本《水浒传》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等小说与医书，对东亚书籍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；四堡书籍则辐射至琉球、安南等地；福州不仅是中、琉、日书籍贸易的枢纽，而且从《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》来看，福州是传教士进行“书籍传教”的主要地区，如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在福州曾刊刻至少四部天学书籍，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、葡萄牙传教士何大化等人也有在福州刊书的记录。^⑥另据法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的《福建福州府钦一堂刊书板目》，明末清初福州的钦一堂至少刊刻有51种天学图书。^⑦结合琉球书籍多自福州购回的情况，此时的福州可谓是京城及江南之外另一大中外书籍互通的窗口。

清前期的福建形成了以福州为中心的书籍供销网络，它向内关联建阳、四堡和江南等出版腹地，对外经由海路连接琉球、日本等域外市场。而福建便利的出版条件、繁荣的书籍市场、多元的书籍文化，无形之中导引着琉球学人的书籍活动。究其根本，是清代对琉球实行的优待政策、琉球学人的群体性努力，以及福建内外书籍供销网络的紧密联动，共同推动了汉籍入琉的历史进程。

三 书籍传播与中琉文化交往的深入

书籍的流通时常带来相异文明的碰撞与交融。此前人们重视精英群体在中琉文化交往中的作用，但倘若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汉籍流布进程，中华文教难以真正深入海外社会。17世纪末，琉球建立孔庙，逐渐发展出以儒学为核心的文教体系，图书需求陡增。此时期大量汉籍进入琉球，得益于琉球学人对福建书业的广泛利用。

首先，福建的书籍供销网络为琉球人购买汉籍、出版著作提供了便利条件。琉球在16世纪仍处于“国无典籍，其沿革不能详然”的文化荒蛮状态^⑧，直到程顺则等人将大量汉籍和雕版带回本土，才逐渐改善了琉球书籍匮乏的情况。检阅各类琉球汉籍，即可发现福建本的影子可谓是无处不在。^⑨应注

① 三书的翻刻情况，参见陈旭东编著：《日本翻刻建本汉籍图释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，第9、212-215、322、326、308页。

② (美)包筠雅著，刘永华等译：《文化贸易：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34页。

③ (日)高津孝：《琉球における書物受容と教養》，载(日)岛村幸一编：《琉球：交差する歴史と文化》，第158页。

④ (明)胡应麟：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卷4《经籍会通四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43页。

⑤ (清)杨澜：《临汀汇考》卷4《物产考》，光绪四年刻本，第3b页。

⑥ (法)费赖之著，冯承钧译：《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》，中华书局1995年版，第95、137-140、198、229页。

⑦ 谢水顺、李珽：《福建古代刻书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360-361页。

⑧ (明)陈侃：《使琉球录》，《台湾文献丛刊》第287种，第24页。

⑨ 陈正宏：《琉球本与福建本——以〈二十四孝〉〈童子摭谈〉为例》，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12年第1期，第104页。

意，京城、江南也有发达的书籍市场，但多数琉球人不能前往这些地区。对于能够进京的琉球贡使而言，京城也并非唯一的购书地点，琉球贡使往返时经过的建阳、福州也可满足需求。在可行性上，琉球人亦难以在京城等地大规模购书。无论是中国册封使，还是琉球进贡使团，他们输往琉球的货物大多都在福建置办，这一方面是因清廷的优待政策主要落实于福建，另一方面也因福州与京城有千里之遥，若往返时携带过多的物品和书籍，必然“广费夫力，至难莫大焉”。^①因此，在福建购书是最佳选择。作为全省的贸易中心，福州比建阳及四堡更便于琉球人开展活动。在此既可买到建阳、四堡及江南的图书，也能在刊书时调用建阳刻工及闽西的纸品，购书后更是可以就地装货归国。此皆福建书籍供销网络带来的便利，亦是琉球人主要在福州开展活动之缘由。

其次，借由福建书籍供销网络搭起的文化桥梁，琉球人得以逐渐以闽刻汉籍为母本，将相关书籍本土化，从而助力琉球社会的发展。如琉球学者用官话将清初的白话小说《人中画》重编为故事文本，用作教材读物；《尊驾》《百姓》也是琉球人自己重编的汉语教科书^②。伴随18世纪琉球学校教育的发展，汉籍教材也有了层次之别。《三字经》《二十四孝》等书成为琉球初等教育的通用课本，《六谕衍义》《小学》等书主要为次级教育使用，在久米村明伦堂和首里的国学当中，则以《四书体注》《五经体注》《二十一史》《近思录》及《唐诗合解》为教材。^③各地兴起的私塾则主要以《十三经注疏》为教学内容。^④这些教材多刊印于福建，并以图书和书版的双重形式输入琉球。而经史之学进入琉球学校科考的情况，也证明儒家文化已日益深入琉球社会。

明代中琉虽有200多年的交往，但当时琉球“亦不过粗知大义耳，而文章风雅未之有闻”。到了18世纪，历任琉球国王多受儒学熏陶，并精通汉诗。至于能出入经典、吟诗作赋的士大夫亦不可胜数。至迟在雍正年间，琉球的风俗教化已被清人所认同：“其国风尚民情，大率与我中国略同，好诗书，喜歌赋。自国王而下莫不能诗。谓其国中建圣庙，设师儒，训诂讲解，名有专职。六经诸书而外，复讲‘上谕十六条’。余初闻之，疑近自誉，及出其《中山诗文集》示余，展读一过，始信其言之不谬也。”^⑤可见，琉球文教得到了快速发展，原先“崇信巫觋之术”的风俗亦渐趋淡化。^⑥结合官话课本中琉球人“四书五经都读”“读书、写字和中国都是一样”等对话^⑦，可知琉球已颇具华风，“向学之诚，视朝鲜若尤勤焉”^⑧。

由福建传入的医书等实用类书籍也对琉球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。16世纪时，琉球“国无医药”，入清后，琉球屡次派人赴闽习医，后来成名的魏士哲、吕凤仪等人皆在其列。这些来华习医的琉球人需研读《医宗金鉴》《本草纲目》等60余种汉籍医书。^⑨而建阳、四堡都是供应医书的重镇，琉球医者接触医书较为容易，一些医书正是通过他们传入琉球和日本萨摩地区。善书的流播线路同样如此，琉球版《太上感应篇》的母本，正是从福州传入的闽版《敬信录》。^⑩而闽版善书的输入，也持续影响着琉球刊印善书的风潮及其庶民教化。

第三，福建书籍的供销网络带动了琉球纸品市场和出版业的发展。琉球四面环海，林木资源匱

① (日) 冲绳县历代宝案编辑委员会：《〈历代宝案〉校订本》第1册，卷14，日本冲绳县立图书馆史料编辑室1992年版，第469页。

② 《尊驾》《百姓》已收入《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》第33册。

③ (日) 高津孝：《琉球における書物受容と教養》，载(日) 岛村幸一编：《琉球：交差する歴史と文化》，第157-158页。

④ (清) 齐鲲、费锡章：《续琉球国志略》卷2《学校》，《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》第29册，第454、457页。

⑤ (清) 任五伦：《中山诗文集序》，《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》第22册，第338-339页。

⑥ (琉) 蔡铎、蔡温、郑秉哲：《〈中山世谱〉校注本》卷9《尚敬王》，第148页。

⑦ (琉) 佚名：《学官话》，《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》第33册，第142页。

⑧ (清) 孙衣言：《琉球诗序录》，《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》第31册，第125页。

⑨ 何兰萍：《清代中国培养琉球医学人才的个案研究——以〈琉球百问〉为中心的考察》，《中医教育》2014年第3期，第73页。

⑩ (日) 酒井忠夫著，孙雪梅译：《中国善书研究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804-810页。

乏，因而缺少雕版印刷业所需的原材料。其纸品与书籍市场的开辟，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福建。前揭福建的造纸业发达、纸品性价比高，康熙时，一批琉球人赴闽学习造纸工艺，琉球“造纸自此始”^①。此后闽纸成为中琉贸易中的重要物品，在琉球出版业快速发展的18世纪，琉球人通常会从福建运回大量纸张。如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琉球使团带回毛边纸57600张、大油纸2000张、红纸1000张；乾隆四十一年购毛边纸210060张、甲纸43516斤、红纸200张、大油纸2100张及纸画29张。^②毛边纸即主要用于书写和印书。类似的档案记录在19世纪后仍较常见^③。可见琉球购纸量之大、持续时间之长。源源不断的闽纸为琉球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材料基础，从福建传入的汉籍书版则助力了琉球出版技术的进步。琉球人或覆刻闽版使用，或在其基础上改造，逐渐探索出了本土化的书版模式与图书内容。至迟在乾隆年间，琉球已可按需自主印刷汉籍。

第四，福建的书籍供销网络拓展了东亚“书籍环流”的范围和层次。“书籍环流”包含书籍在传播中的多向循环，书籍内容的阅读、接受并反应的互动，以及由此引发的观念和文化立场的变迁。^④而闽刻汉籍直接影响了琉球文教，也广泛流传于日本社会，显然构成了“书籍环流”的重要一环。其中的典型是《六谕衍义》，此书用简明之语阐释了明太祖的圣谕“六言”，便于在民间传播。它不仅成为琉球学校的用书，而且江户幕府也对其进行了校对和翻译，所成《六谕衍义大意》在明治维新前都是日本地方学校的指定教材；程顺则在福州出版的《指南广义》则校明了往返中琉的针路，并载有中日海域的地理、天文等资料，成为琉、日来华人员的必备指南；^⑤近世琉、日社会共享的重要汉籍资源还包括程顺则的《学燕堂游草》及其恩师陈元辅的《枕山楼课儿诗话》，前者影响了日本的绘画与诗文创作，后者则成为了琉、日学人的诗歌入门教材。^⑥相似之例，不一而足。

不仅从福建传入琉球的书籍进一步流播至日本，中国的许多佛道经籍也在琉球与日本、朝鲜的海上贸易中“环流”。《历代宝案》中载有琉球通过朝鲜输入的汉译佛道经籍，有《法华经》《道德经》等。而日本人在唐代以后便时常从中国购书，其“四书五经及佛书、白乐天集，皆得自中国”^⑦。故琉球也有部分汉籍是从日本传入的，如毛利贞斋《四书俚谚钞》和黄坚的《古文真宝》，在朝、日、琉三国均被视作诗文入门教材。^⑧再如《玉烛宝典》《古文真宝》等在中国几近佚失的古籍，即得益于琉球等国的保存，重新为国内学界所注意。^⑨《六谕衍义》也存在相似的流转路径，即由闽入琉，再由琉入日，近代以来，它又作为珍本古籍回到国人的视线当中。

当然，不只琉球人充分利用了福建的书籍供销网络，清人同样借此加深了对琉球社会的认知。福建文士与琉球学人交游酬唱，为之撰写诗文序跋，并利用福建书业，刻印与琉球相关的著作。如《小琉球漫志》《琉球国志略》等书多刻印或覆刻于福建。^⑩这些活动既反哺了福建书业，又增强了

①（琉）郑秉哲：《琉球国旧记》卷4，《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》第15册，第61页。

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：《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》，中华书局1993年版，第154-157、172-174页。

③ 如嘉庆二十六年，琉球人仍购“毛边纸118000张”“甲纸28400斤”“大油纸1800张”，参见《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》，第533-534页。

④ 张伯伟：《书籍环流与东亚诗学——以〈清脾录〉为例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14年第2期，第165页。

⑤ 《指南广义》甚至成为了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力证。参见万明：《明代历史叙事中的中琉关系与钓鱼岛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16年第3期，第84-85页。

⑥（日）上里贤一：《琉球对儒学的受容》，《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》第3卷第1期，2006年，第13页。

⑦（清）潘相：《琉球入学见闻录》卷2《书籍》，《台湾文献史料丛刊》第299种，第78页。

⑧（日）高津孝：《琉球における書物受容と教養》，载（日）岛村幸一编：《琉球：交差する歴史と文化》，第154页。

⑨《玉烛宝典》的流传参见（日）石川三佐男：《日中“书籍之路”与《玉烛宝典》》，载王勇等著：《中日“书籍之路”研究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32-41页。《古文真宝》自元末传入朝鲜和日本，影响力经久不衰。近年在中、日、韩学者对异域汉籍的研究中，此书受到了特别关注。参见熊礼汇：《〈古文真宝〉的编者、版本演变及其在韩国、日本的传播》，《人文论丛》2007年卷，第471-503页。

⑩（清）朱仕玠：《小琉球漫志》卷首《自序》，《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》第29册，第12-13页。如《琉球国志略》等书也在不同时期出版或重刻于福建。参见谢水顺、李珽：《福建古代刻书》，第386、398页。

中、琉士人彼此的交流与文化认同。

总之，不论是琉球对汉籍的吸纳、文教的发展、出版业的开辟，抑或东亚的“书籍环流”过程，都与福建及其书籍供销网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四 “书籍之路”与东亚文化中的局部和整体

“琉球自入清代以来，受中国文化颇深”^①，这一影响通过东亚海域的“书籍之路”^②，实现文化的局部扩散与整体丰盈。中琉两国虽建交于明初，但汉籍入琉却是康熙朝以后才大量出现的现象。在清廷的对琉政策下，琉球得以派遣大量勤学生常驻闽地。福建形成了以福州为中心，向内关联建阳、四堡和江南等出版腹地，对外连接琉球、日本等海外市场的书籍供销网络，其繁荣的图书市场和多元的书籍文化，无形引导着琉球学人的活动。这种在政策、学人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产生的历史性关联，深刻影响了琉球文明的发展。

从根本上说，汉籍的传播是一种文化的流动形式，其影响比人本身的活动持续时间更长、涵盖范围更广。伴随着中琉学人的频繁互动和汉籍入琉的历史进程，中琉之间的交往也得以逐层递进，最终触及思想文化层面的互动。由于琉球木材稀缺、出版业落后，故琉球人首先借助福建书业改善本土书籍匮乏的情况，并通过引入闽纸和闽版，带动琉球出版业的进步。之后，琉球人以闽刻汉籍为母本，逐渐探索出本土化的书版模式与教材内容。而各类汉籍的普及，又影响了琉球教育、医疗和礼俗的发展。可见东亚的海路已不只是朝贡与商贸之路，亦是一条流播中华文教的“书籍之路”。

同样，在该时期成形的是东亚的“书籍环流”网络。“明清时期的东北亚存在一个‘书籍环流’，书籍通过‘海上书籍之路’和‘陆上书籍之路’在江南、北京、辽东、朝鲜、日本之间流转成一个国际性的圈形网络。”^③但“书籍环流”还应包含福建、琉球这两大地区。尽管在汉籍的域外传播上，福建的总体影响或许不如北京和江南，琉球对汉籍的吸收亦不及朝鲜。然而福建在17至19世纪中、琉、日之间“书籍环流”的过程中曾处于枢纽的位置。琉球人的活动也昭示出他们在汉籍传播中的某些过渡性作用，类同于琉球在东亚经济贸易“中转站”的角色，尤其在清前期中日关系几近隔绝的情况下，作用更为显著。因此，东亚的“书籍环流”网络只有涵括福建和琉球才符合历史事实，也才足够完整。

正如李伯重所言，儒家文化圈在15世纪后才在东亚世界取得实质性进展。^④对于东亚世界中最小、“藩俗”最深的琉球而言，正是17—18世纪中琉书籍之交的深入，使得中华文教日益渗透到了琉球社会的各个环节，由此，儒家文化圈也得以进一步扩大。而中、琉、日海域的“书籍环流”过程，亦体现出不同时期中琉、中日及日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，并延续影响至今。

【项目说明】中国人民大学2023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资助计划成果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重大基地项目“清代政教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”成果，项目编号：22JJD770062。

（作者孙岩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邮编100872）

（责任编辑 哈恩忠）

① 《清史稿》卷526《琉球传》，中华书局1977年版，第14621页。

② 王勇提出古代中日海域存在一条“书籍之路”，它以汉籍、海路和学人为依托，以精神文明互动为内核。参见王勇：《“丝绸之路”与“书籍之路”——试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》，《浙江大学学报（人文社会科学版）》2003年第5期。

③ 黄修志：《书籍与治教：朝鲜王朝对华书籍交流与“小中华”意识》，《世界历史》2018年第1期，第62页。

④ 李伯重：《火枪与账簿：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》，三联书店2017年版，第206页。